

中國解放區見聞

著曼爾福·美
譯進朱



*** 中國解放區見聞 ***

美·福爾曼著
朱進譯

一九四六年七月

中國解放區見聞

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出版

著譯出
版者者發行者

朱美福
山東新華書店
進曼

總分店：臨沂東大街
膠東·渤海·魯中·魯南

分支店：

泰寧竹東諸安城庭海城
十
字
路
縣
縣
照

新
安
高
莒
藏
臨
沂
北
馬
沫

序

中國的八年抗戰，依靠了大後方人民的血汗，更依靠了敵後解放區人民的血汗，終於在蘇聯紅軍開到了東北以後，完全勝利了。在八年抗戰中間，大後方人民，可歌可泣的事情太多，却還很少有人來記載着。解放區呢，幸運得很，不但有自己的作家來紀載，更有友邦的作家來著書立說，傳播中外。這部國際友人福爾曼先生的中國解放區見聞，也就是其中之一吧！

解放區人民的苦鬥，不但要對付敵人，同時也要對付一切國內頑固落後非民主的法西斯的份子，那當然是非常艱苦的。一切交通的封鎖，經濟的封鎖，文化的封鎖，到今天講起來，還是言之有餘痛吧。靠了國內和國外民主的潮流，靠了各階層民主人士的犧牲奮鬥，終於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終於雙方下了停止內戰的命令，終於執政當局發出了四項政治上的諾言。那末，以後的解放區，應該成爲民主自治示範區，應該成爲國內最先實行三民主義的實驗區，大概不會再受到各種封鎖的痛苦，和各種頑固落後份子的圍剿吧。紀念舊時的奮鬥，開拓方新的天地，對於這部中國解放區見聞的繙譯和出版，我是非常高興地祝頌它，祝頌它能够成爲新中國進步道路上的一塊紀程碑！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亞子於上海

滿佈山東軍區的——

新華書店發行網

總店：臨沂東大街

直屬分店：諸城 日照 泰安 新安

支店：

山陰城山邱鄧
蒙縣歷邱安鄧
沂東寧邱川北沂
沂泰章淄沂高
中源安歷齊沂南
沂沂泰章萊臨沂

魯南

縣店店
縣縣城
縣縣河
縣費臨
縣曲滋平趙
縣阜陽邑鄧莊

水水縣兒莊
泗麗陽台兒莊

膠東

總分支
店店店

陽台成島山前濰龍西掖
煙榮石乳牙棲黃棲平昌
陽山口遠掖西南
海福龍招北萊
登海度萊縣東北北

渤海

總分支
店店

濟南皮
濰濰縣
惠民縣
濰濰縣

魯中

總分支
店店
博山泰山沂山

濱海

縣店店
縣縣城
縣縣河
縣費臨
縣曲滋平趙
縣阜陽邑鄧莊

鄧萬膠
縣縣城
縣縣河
縣費臨
縣曲滋平趙
縣阜陽邑鄧莊

►如附近分支店未能買到你所需的書籍請函註明總店郵購科

目 錄

柳亞子先生序

一：重慶底緘默	一
二：那是集中營嗎？	五
三：踏進解放區	九
四：延安	一二
五：混合經濟	一五
六：鄉村民主	一九
七：生產運動	二十四
八：日本人民解放聯盟	三六
九：抗日根據地	五一
一〇：軍事記錄	五五
一一：晉察冀邊區	六〇
一二：新四軍	六〇
一三：國民黨對共產黨	七二

一四·這是共產主義嗎?.....

七七

一五·他們是共產黨嗎?.....

八三

一六·中國要起內戰嗎?.....

八八——九三

一 重慶底緘默

中國爲自己底生存對日本的絞殺式封鎖進行了數年戰爭，但是，五十餘萬的中國最精銳軍隊卻作對內封鎖之用。這的確是世所罕有的奇觀，這便是中國再爆發內戰的先兆。

我們都知道那個封鎖的存在，那已成爲一個公開的祕密，對於駐在重慶的外國記者那更是一件只可私語而不可公開談論的怪事。我們外國記者誰也不知道封鎖線裏的真象。我們除了引用蔣委員長或其他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們譴責共產黨時所說的『強佔國土』『攻擊國軍』『阻礙抗戰』等屬言之外，在我們底任何報導中絕不許提及共產黨一個字。這種辦法自然而然地激起我們對共產黨的興趣。無論從那個角度看，我們外國記者既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共產黨底同情者。中國共產黨宣稱他們在華北及華中掌握了九千餘萬的民衆，這個數目幾乎等於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三，只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便令人感到驚奇。在過去五年間，中國政府從未允許任何記者到解放區。我們曾屢次請求中國政府允許我們去訪問這些地區。中國政府對我們雖未斷然拒絕過，但是，卻始終搪塞地說：『等等』『現在不方便』『情勢紊亂』等遁辭。

在封鎖線裏究竟發生着什麼事情呢？中國共產黨的確像中央政府所描寫的那樣兇惡嗎？他們是叛變地攻擊中央軍嗎？他們與南京偽組織勾結嗎？他們壓迫民衆嗎？他們逃避對日作戰嗎？他們與俄國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在日本與國民黨底二重封鎖之下怎樣處理一切呢？國民黨與

共產黨的基本分歧在那裏呢？而且有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呢？他們在對日戰爭中究竟在作及能作些什麼呢？從純正的新聞立腳點，這些以及其他劉切的問題都需要根據目擊事實與實在事實的回答。但是，在共產黨繼續被封鎖的情形下，我們便無從有機會得到這樣的回答。

去年春某日，政府發言人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答覆我們底問題時，公然地否認中國境內有任何封鎖共產黨地區的封鎖線。我們馬上就抓住了這個漏洞，我們作一張直接呈給蔣委員長的請願書，駐在重慶的全世界外國記者在這張請願書上都簽了字。在下一次的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我們把請願書正式地公開地交給政府發言人請他轉呈蔣委員長。使我們大吃一驚的是：蔣介石將軍竟同意我們去訪問解放區而且我們還是以中央政府賓客的資格去訪問。不過我們等了好幾個月才實際由重慶出發。

從重慶到寶鶴乘卡車大汽車需時一個禮拜或一個多禮拜，在中國後方卡車與大汽車時常拋錨，有時幾分鐘便可修理好，但是，有時須等好幾天才成。坐飛機兩小時便可到寶鶴。我們得到了特許飛行，六位外國記者與十五位中國記者坐一架由美國人駕駛的大型道格拉斯DC-30飛機由重慶啓程。我們被公稱為「西北記者考察團」。

從寶鶴換火車東行，大約在夜半我們底特別快車到了西安。在燈火輝煌宮殿式的西安車站，有一百位左右的西安名士在歡迎我們。賓主經過了一番介紹及交換過名片之後，我們被接到豪華的西安招待所。我們在西安過了四天很有趣的生活。因為我們是蔣委員長的賓客，所以西安地方政府官員真是不知道如何款待我們才好；因為我們是政府的客人，所以他們應給予我們一切的便利與幫助；因為我們是眼光銳利的新聞記者，所以我們也許會看見他們所避忌的事而得到壞印象。因此之故，在形式上的交往中彼此都是笑容滿面而且非常客氣，但是，在暗地裏西安的官員們却監視着我們底一言一動而把它記錄下來。以後我們才知道：那些頑強地拉我們坐車的黃包車

夫都是被特別派到招待所的特務份子。我們拒絕坐他們底車的時候，他們便到處尾隨着我們。我們溫和地向他們提出抗議之後，他們才一溜而散。黃包車夫散去之後，隨後便來幾個身穿普通衣服的特務，他們都騎着腳踏車，等我們在街上隨便坐車時，他們便跟在我們後頭。我們以和悅的態度觀看他們底動靜，有時我們對他們笑一笑或逗他們一下。他們一點也擾亂不了我們底心緒。我們不能斷定所有這些特務的行動究竟是出於重慶命令呢或是出於素與重慶當局採同一步驟而聞名的西安地方政府底指令。

有一天當我走進招待所的時候，一位私人信差遞給我一封信，這封信是用英文寫的，我把它一字不漏地抄在下面，但是，因為這封信的簽字是發信者底真名，所以我只把它略去。（譯者附註：這封信相當長，暴露了許多詳情，但因此只好不譯。這是對讀者很覺抱歉的。）

初看這封信雖像是半狂人所發出，但是，因為它充滿了特別情報，所以絕不能置若罔聞。我們在西安依照各機關的重要性順序地作了四個正式武官訪問。首先我們訪問胡宗南司令部，其次為陝西省主席官邸及國民黨西安支部，最後為臨時國民參政會。胡宗南司令部很豪華且很舒適。被指定的接見人依照官階依次排列在西太后於義和團之變時逃出北平到了西安所住的精緻的皇宮，一直排到一個石頭地紙窗戶設施樸素大小約有十五平方呎的屋子裏。在這間屋子裏有三位長輩子的臨時國民參政會老代表迎接我們。他們都表現了一種局促不安的表情，他們恐怕因一時的不小心而說錯了話。

在司令部，胡宗南底參謀長羅澤闡出來招待我門。他說自己是胡宗南底發言人。他穿一雙高過膝蓋的馬靴，及一身漂亮的軍服，他曾扈從蔣委員出席開羅會議。他雖然十分懇切地款待我們，但是我馬上就嗅出了一股潛在的敵意，他似乎憎惡對我們這些管閒事的外國人表示親切。使我們吃驚的是：羅澤闡竟坦白地承認中國有封鎖共產黨的封鎖線。他們「封鎖」不叫「封

鎖』而美其名曰『包圍掩護區』。他舉了很多理由替自己辯護，第一他堅持地說共產黨不服從軍令，共產黨軍隊在名義上是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底直接指揮，但是他們拒絕在指定的地方駐防。他們違抗閻將軍底命令，恣意渡過黃河東岸非法擴張地盤。此外他們所到之處立即驅除中央政府或國民黨底官吏而代以蘇維埃組織。關於抗戰他們所採的政策是『不打硬仗』『敵進我退』。這種現象在河北山東兩省已層出不窮，在這兩省共產黨故意退出讓日本人進來。在過去六年間共產黨從未與敵人打過一次仗，所以期待他們今後與日本作戰那更是妄想。你們所樂於稱道的『封鎖』並不是封鎖共產黨而是封鎖日本軍，因為敵人說不定就會從無抵抗的共產區來攻打西安及中國後門。

這的確是一個怪誕的說明，而且也是一個使有智慧的我們不能置信的說明。

在省主席官邸，祝紹周也承認中國境內有封鎖共產黨的封鎖線。他鎮靜地說：『那條封鎖線是一條「大溝」。隔不遠有一個「小房子」，每個「小房子」有數十人把守着。』他強調地說：『這條掩護線為防止共產黨非法擴張領土是非常需要的。共產黨頑強地擴張他們底土地，一直到中日戰爭他們底統治區域已三倍於昔日。』

我知道祝紹周所說的『共產黨擴張領土』是百分之百地不確實，因為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勃發數月前我會訪問共產黨區一次，當時的共產黨底統治區域的確比今天的大，從那時起，中央軍便加緊地把共產黨壓縮回去了。

祝主席責備共產黨，說共產黨殺戮非共產黨；當中央軍與日本軍作戰時叛變地攻擊中央軍；販賣鴉片，邊區三分之一的最肥沃的土地都種了鴉片。這都是毫無根據的辱罵。我在邊區整整遊了五個月，但是，我未看見任何形式的鴉片形跡。

二 那是集中營嗎？

我們曾聽說在西安有一個特別訓練營，那是一個爲從解放區出來的人們而設的政治監獄，那是集中營嗎？所有的回答都一致地說那不過只是有些人們志願進去改造自己底思想，準備走向新生的所在而已。

我們請求去參觀，西安當局躊躇了兩天然後終於同意了。在我們去參觀的頭一天晚上，我們讀了註在節目單上的『注意』，內容是：『勞働訓練營由軍事委員會建於一九三九年冬，目的是給予由共產黨區逃到西安來的無家可歸的青年以短期訓練。由勞働服務，青年們學習生產技術及經商之道，以便他們能參加國家戰時工作。勞働訓練營內有經理班，化學工業班，政治班與工場。營中的訓練政策，管理方法，食住以及其他諸種條件與政府所辦的其他訓練機關相同。』

我們在一個天朗氣清的午後坐一輛豪華的特別汽車出了西安西門直赴該營。它位於飛機場附近，四面圍以高牆，有兵把守着。勞働訓練營已爲我們準備妥當，牆上樹上都貼着紅的或黑的標語，從屋簷到房簷也都用繩子掛着標語。這些用英文寫的標語有『歡迎西北記者考察團』『我們要爲和平正義民主而戰！』『打倒法西斯！』等。每個翻譯員都像水蛭一樣地寸步不離地跟在我們外國記者後面。勞働訓練營雖然地是經過了一番洗刷，牆上的白粉還沒乾呢。

我們開始在營內巡遊，房子雖然密一點還不算太壞。每件東西都是嶄新嶄新的。毛巾，被單

手巾以及學員們所穿的制服也都是新的，他們底頭都刺得溜光，與被太陽晒黑了的臉成對比，腦袋閃閃發光。我們從窗外注視着教室，裏面的學生們，他們整齊齊地坐得又挺又硬，一點也不理會我們。他們聚精會神地聽教師講古代史，我們底奇突的出現一點也不能惹他們注意。

我在操場上走了一圈，然後回來參加茶會，翻譯員始終跟在我底後頭。當我走過方才那個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聽古代史的教室時，我們發覺他們已下了課，因為教師已不在教室裏，學生們又亂講亂談，他們大概是在講我們。我突然站下看着他們，一時之間他們竟有點驚惶失措，但是不一會兒他們就恢復了原來受過訓練的好學生姿態。我進屋坐下，打算與他們談談，但是他們却有些局促不安，他們看看我，再看看翻譯員，他們用這種眼光給我一個曖昧的答覆。我聳聳肩，不得已離開了他們。

在這裏我要把我底記述先提前一步，我向讀者報告一下我與兩位青年間的一段有趣的談話。幾個月後我到延安時，這兩位青年來訪問我，他們一位叫王爾明，一位叫羅超英，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我們訪問西安勞動訓練營時，他們都在那裏。他們不肯講他們由勞動訓練營逃出的原委，因為他們怕連累幫助他們脫逃的朋友。但是他們對我暴露了勞動訓練營底內幕，以及特別是當我們訪問該營時的情況。

他們首先告訴我他們進勞動訓練營的經歷。一九四四年春老王是西安某防空學校的無線電生，他給一位朋友寫封信，裏面提到蘇聯新憲法。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只是他對於一本書感覺興趣，在西安書店裏買一本讀一讀而已。郵政局檢查了那封信，然後把它送到陸軍司令部。其間老王因特別任務已赴天水。一天，夜裏有兩個不速之客闖進他屋子裏拿着手槍逼他跟着走。以後他就被關在一間單獨禁閉室裏，誰也不審問他，誰也不而且也不可能告訴他為什麼被捕。以後他又被押赴蘭州，關在政治監獄裏。兩個禮拜後，他被提到一位姓趙的上校面前，這位

趙上校兇狠地審問他爲什麼研究蘇聯新憲法，這時老王才恍然大悟被捕的原因。他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底間諜，他說他從未到過解放區，並且他更申訴他所以對蘇聯憲法感覺興趣，就是因爲國民黨要結束訓政，在各方面都掀起討論憲法的熱潮，自己也要研究研究憲法究竟是什麼東西。

趙上校下令鞭打並給他上刑逼他招供。這種拷問一直繼續到一九四四年四月，然後他便戴上镣铐被送到西安勞働訓練營。他不知道服徒刑的期限，他也不敢問，因爲他恐怕再被關進單獨禁閉室裏。

羅超英是我任延安遇到的另一位逃獄者，他從十三歲起就在東北軍裏服務，七七事變時他逃出東北加入林彪底紅軍。一九四〇年他隨着林彪底參謀長陳將軍爲軍務赴新疆。陳將軍在新疆因病入院，老羅也與他在一起。當他們於當年十月由新疆回來的候，兩個人就在西安被捕了。西安當局不承認他們底一切證件，硬說他們是間諜。他們底軍服有點出奇，很令人注目，他們雖然解釋他們底軍服是俄國料子而且是在新疆做的，但是西安當局一聽也不信。

羅超英與陳將軍被關在單獨禁閉室裏幾有三年之久。在獄中他們時常被拷打上刑並且提到各式各樣的高官面前迫令他們招認所有的罪狀。結果，陳將軍因受傷過重失却意識死在獄裏了。年輕的羅超英，便被提到一個法庭被判無期徒刑，關在西安勞働訓練營。

在勞働訓練營裏老王與老羅每天須做一些手工作品。那裏底訓練非常苛嚴，犯過就被懲罰一頓殘酷的體刑。在課堂裏他們唸三民主義，蔣委員長言論集，中國歷史及所謂「叛黨」——共產黨——與「叛軍」——共產軍——底罪狀。關在營裏的青年除了同意幹反共的工作外一輩子就別想被釋。在營裏，「共產黨」雖被稱爲「奸黨」，但是在我們去訪問的時候，那裏的囚犯們早已得到了不許對記者團稱「共產黨」爲「奸黨」的命令。

老王一面笑一面說：「當你們訪問勞働訓練營的時候，我們都得了一套新制服，我們真喜歡

極了，因為我們實在是需要一套新衣服啊！訓練營當局告訴我們好好保存那套新制服，但是，新毛氈及其他東西當你們離開訓練營馬上就送回陸軍七分校了。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專門為應付你們底眼光從陸軍七分校借來的。』

當記者團訪問勞動訓練營的頭一天，那裏底學生被分成許多小組，每組有一個組長來指導他們練習針對『問題表』的『正確答覆』。訓練營預先占卜了我們記者所要問的問題，然後把這些認為可能要問的問題用油印機印好分給每個學生去練習。所以當我們向他們提出問題的時候，我們便得到一套已事先準備妥當的回答。學生們事先都被警告過：誰要不按照準備好的公式去回答，他就要得到一個嚴重的結果。

老王老龜更告訴我很多其他的珍聞，因限於篇幅我不打算在這裏發表。在訓練營時，他們二人僅僅能從遠處看我們記者團，他們那組中的一個孩子要不顧自己底結果將勞動訓練營的黑幕暴露給我們，但是因為他距我們太遠，所以終沒得到機會。可是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得以安全逃脫。原來，被訓練營當局信為能說幾套已製造好的謠語的學生才被排在記者團周圍，其餘的，也就是不被信任的學生們，都被小心地擺在後面了。

三 踏進解放區

在一個夕陽西下的午後，我們一溜一滑地走下一條亂石滿地左灣右曲的羊腸山路而來到黃河渡口，我們在渡口等着那些已筋疲力盡的落伍者，約一小時左右，大家都到齊了，然後我們便搭上兩條平底船開始衝渡黃河激流。由於整天在烈日下跋涉的緣故，我們實在疲倦極了，在船裏我們竟似睡非睡地在不知不覺之間就進了解放區。在進入解放區之前，我們沿途倍受熱烈歡迎接待。可是因為我們是從旁門進了解放區，所以並未受到同樣的歡迎與接待。三位表情沉默的軍官從渡口的小村莊——涼水崖出來迎接我們，把我們安排在一個農莊裏。

翌晨，一位軍官帶着三個衛兵來正式歡迎我們。他們從延安出發翻山越嶺已不停地騎行了兩晝夜，但是他們還是精神十足好像是在鄰居的農家過的夜。他們四位都穿着同樣的藍色軍服，戴着同樣的軟軍帽。除了在領尖上帶着紅布條之外，他們沒佩帶任何徽章。三個衛兵好像好萊塢電影中的惡漢一樣，後屁股吊着匣槍，肩上抗着來福槍，後背背着日本武士的軍刀。他們三人雖然不對他們底長官敬禮，並且很泰然地與他在一起，但是，這些武器就是他們尊敬他們底長官的證明。

在最初見面的一剎那，這位軍官並沒有什麼特別惹人注意的特徵。他很少開口也沒什麼虛偽作風。幾小時後，我們才知道：他就是共產軍裏很負盛名的王震將軍。他才三十七歲，他是一位

經過了內戰與抗戰有十七年戰爭經驗的老門士，他底矮小而雄勁的身上竟刻着七處戰傷的創疤。最初，他雖然好似有些陰鬱與馬虎。但是當我們在一起赴延安時，我們就漸漸喜歡他了。當我們大家都免去了初見面時的客套之後，我們便發覺了他是一位爽快的青年，並且像小孩子似地對我們底照慢機、打字機或其他的新奇裝置感覺驚奇。他笑的時候露出牙齒，他不停地吸着一枝有斜度的外國式烟斗，這支烟斗的烟桿已經斷了，他把它用布纏得像他那隻光着脚穿草鞋的大腳指一樣粗。他在肩上掛着一幅日本造的大望遠鏡。他順口說：「這個望遠鏡是在一個小戰鬥裏從一個日本軍官得來的。」我們後來知道了他所說的『小戰鬥』就是：有一次他埋伏了一千五百名紅軍準備攻擊在內蒙公路上馳行的日本運輸隊。當擁有一千名兵，五輛戰車及四十五輛軍車的日本運輸隊觸發了公路上地雷的時候，王震便率領他底部隊開始攻擊。日本軍見勢不利拍電求援，馬上就來了十五架轟炸機投下催淚彈與窒息彈。王震部隊因為當時沒有防毒面罩，所以不得已便被迫撤退了。他們打死了七百名敵人，自己也死了三百六十人。王震當場活捉了一個日本軍官，那個望遠鏡就是這個日本軍官贈給他的。原來共產黨底俘虜政策是絕不扣押要求返回本隊的敵人，所以那位日本軍官被釋放了，他把望遠鏡送給王震作為臨別紀念。那位軍官回隊後便被槍斃了，因為他當了八路軍底俘虜，傷了日本軍底尊嚴。

王震說：「有一次我們捉住一個日本少將，他不願回去受處罰，所以就跟我們一起走了。敵

人得到這個情報馬上派轟炸機來襲擊我們，敵機發覺了我們是停在一個村子裏，所以便向全村投彈，那位少將便被炸死了。」

我們愈向西行則土地愈呈荒涼，但是我們，若一眼望去便能看見一塊塊的地氈似的麥田，玉

蜀桑田及棉花地很危險地點在險峻的山坡上，這赤裸裸地表現了當地人民底勤勉與決心。

當我們走近南泥灣地區時，我們看見每組以十二個人或十二個人以上所編成的軍隊正在田裏